

# 少城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成都

## 少城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

（成都市江汉路222号 610031）

内部准印证川成新出内字(98)0031号

成都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厂址：成都市文家巷

开本32 印张5 字数103千字

---

# 目 录

|                            |          |
|----------------------------|----------|
| 西藏和平解放与四川 .....            | 焦东海 (1)  |
| 川西人民的援藏情谊 .....            | 魏 克 (6)  |
| 成都解放前夕反动武装集团“兆总”之始末 .....  |          |
| ..... 曾庆侯 熊 杰 (11)         |          |
| 中央陆军军官教导五团起义经过 .....       | 熊志敏 (15) |
| 忆高场遭遇战 .....               | 王 涛 (19) |
| 建国初成都军管会接管金融机构的忆述 .....    | 米庆云 (23) |
| 青羊区私营企业的产生和演变 .....        | 范裕臻 (28) |
| “宝元通”经营成功之路 .....          | 戴崇新 (33) |
| 独特的经营 先进的管理                |          |
| ——记长足发展的成都市三多里百货有限公司 ..... |          |
| ..... 叶华英 (39)             |          |
| 青羊区妇幼保健院的变迁 .....          | 黄琳先 (45) |
| 成都市通顺中学的建立及办学特点 .....      | 张志英 (51) |
| 新兴和永恒的事业                   |          |
| ——记青羊区老年大学的成立与发展 .....     | 徐稀星 (58) |

谢霖与成都正则会计学校……………王大炜 (65)

解放前石室中学见闻点滴……………谭明礼 朱之彦 (71)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追忆……………庞孝益 (75)

武担风云……………肖慕良 (81)

记陆军第一预校的建立和改组始末……………思品端 (89)

军人·商人·文化人

——共产党人车耀先……………张绍诚 张先翥 (94)

忆蓉城抗日往事……………赵之楚 (100)

沧桑巨变中的黄埔八期学长朱戒吾……………曾广文 (105)

著名军医出少城……………徐承章 (114)

当代四川禅宗大师贾题韬……………李豫川 (121)

泼墨挥毫心未老

——李灏先生及其书法艺术……………孙人杰 (127)

学者张圣奘诗吟川西盆景……………邹趣涛 (134)

“满城”的兴废……………李定一 (141)

十二桥文化遗址与古少城的历史渊源……………潘前春 (146)

# 西藏和平解放与四川

焦东海

西藏自元朝归入中国版图，历代王朝都有“以川建藏”、“以川治藏”之方略。可见四川与西藏关系之密切。我党对此更是深有远虑。早在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指出：“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电报还明确指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同年11月23日，因西北战事结束较早，毛泽东了解到由西北进藏道路比较平坦，曾给彭德怀发电报，提出以西北为主进军和经营西藏。彭德怀经过调查了解后，认为由西北进藏“困难很大，难以克服”，遂于12月30日，向毛泽东发报，建议由四川打箭炉（即康定）分两路，一路经理塘、科麦，一路经甘孜、昌都入藏。1950年1月毛泽东正在莫斯科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给党中央发报，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1月8日，二野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确定由进驻川南的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1月10日，毛泽东致电党中央，同意二野的计划，由十八军从四川向西藏进军。从此拉开了轰轰烈烈的进军西藏的序幕。

1950年1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接见了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以及部分师以上干部。刘伯承说：“解放西藏是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役。驱逐帝国主义侵

略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这是党交给你们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事业。”

邓小平用亲切的目光环视了大家以后，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但军事和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单靠用兵未解决问题，而解决者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邓小平特别强调：“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十八军根据邓小平、刘伯承的指示，在成都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在全国各地，主要是成渝两地，广招熟悉西藏情况的人士参加工作。先后邀请到了六、七位专家学者，他们有华西大学教授李安宅、于式玉夫妇、著名藏学专家谢国安和他的女婿刘立千，还有精通藏语文的汉族专门人才祝维翰、傅师仲等。

政策研究室主任为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

这些专家学者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工作，即写出了七份有价值的政策资料。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一文。这篇材料全文共写了八个问题，对以后西南局制定的进藏“十条政策”，对1951年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对以后中央对西藏重大行动的决策，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将这八条中的七条内容摘录如下：

#### 一、对西藏现行政教合一制度，对达赖、班禅的态度：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要逐步改革，实行政教分离。但由于西藏人民对宗教信仰的根深蒂固，改革必须根据西藏人民的觉悟程度，有步骤、有计划地在相当时期以后才能达到。

对西藏原有的政权机构应暂保留，对僧俗官员采取团结的方针。目前可成立军政委员会，等条件成熟时，再成立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达赖是西藏最高的政教领袖，对达赖的地位应予尊重。如达赖逃亡国外，不应以班禅代理达赖。对达赖仍应争取，以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

班禅同达赖是西藏宗教领袖，但班禅不问政事，在宗教上亦稍逊于达赖。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后，班禅长期居住青海，班、达对立。我军入藏，以暂不带班禅为宜，以免引起我军入藏是扶助班禅反对达赖之误解。待我军入藏后，作适当调解，再由达赖方面欢迎，班禅再返藏。

## **二、对西藏贵族及僧俗官员的态度：**

除不可挽救的、与人民为敌的、罪大恶极的应于惩办外，一般应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

## **三、对喇嘛（僧官除外）的态度：**

喇嘛在西藏人口中所占数量很大，且又极为集中，是西藏政治、文化、思想上的领导集团，故应根据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不予干涉。但因其对西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之进步阻碍至大，故亦必须分别地逐步教育改造之。对寺庙财产一律加以保护。提倡奖励他们减轻过重之剥削。对宗教活动不予干涉。勉励他们学习生产技能，参加劳动生产。对有声望、有地位的喇嘛保持其合法地位，争取他们成为佛教内部的开明分子。

## **四、对西藏农民及牧民的态度：**

农牧民是西藏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者，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应该亲密地和他们团结，了解并帮助解决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兴修水利、改良农具和耕种方法。帮助牧民发展畜牧业，解决畜产品之出售。

## **五、对藏民社会福利政策：**

为打破民族隔阂，融洽藏汉感情，要以实际行动多为西藏

人民谋福利，如进行医疗服务，举办供销社，提倡家庭手工业及小规模工业，改良交通，修桥筑路，推广寺外教育，包括电影、图画、学校、歌舞、音乐、戏剧等。并尽量用藏区民间形式。

#### 六、改革康藏乌拉差役制度的意见：

乌拉差役制度其弊端主要在土司、头人的剥削和虐待，如去其弊端，改为运输队，当能积极参加支前运输工作。对支前运输队员，有病予以治疗，按解放战士待遇，使他们乐意为人民解放军服务。

#### 七、对西藏的民族自治问题：

根据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规定，西藏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民族自治，使西藏民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亲密团结的大家庭的一员。西藏人民在自愿的原则下成立人民自治政府。

西藏人民有发展其语言、文字及保持和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帮助西藏人民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事业。

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西藏所走过的道路，再看看这个材料，就知道这个材料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重要了。而这些材料都是在成都形成的。

西藏自治区党委的前身——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藏工委）也是在四川成立的。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上报的中共西藏工委组成人员名单，同日，西藏工委在四川乐山宣告成立。西藏工委组成人员共八人，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委谭冠三为副书记，其余为委员。中共西藏工委1950年随十八军进藏，1951年10月抵拉萨。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西藏和平解放。

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时空中，四川对西藏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援是很多的，大量的，现仅举一例：

1950年昌都战役前夕，各项准备工作都搞好了，各部队意气风发，枕戈待命，只等前线总指挥张国华军长下命令了。但张国华紧锁眉头，闷闷不乐，就是不下命令，大家都有些纳闷，不知为何。10月3日，张国华驱车来到川西玉隆县藏族土司夏格刀登家。他向夏格刀登坦率地倾吐了战役发起后的运输困难，夏格刀登听后，爽快地回答道：这不成问题。我可以支援六千头牦牛，我还可以同降央伯姆谈谈，请她再支援二千头。张国华听后，算了一笔账，八千头牦牛，三百万斤粮，年底运过金沙江有把握，于是他高兴了。他回到部队立即下达了进击昌都的命令。

战役发起后，一切进展顺利，10月底我军即解放了昌都。当时昌都大军云集，没有好久我们就发生了粮荒。一天一人只能供应一斤代食粉（即炒面），最困难时一天一人只有半斤，部队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正在这时，后方的牦牛运输队源源不断地把粮食送上来了。这不仅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也为第二年我军顺利进军拉萨奠定了有力的物质条件。四川人民群众对西藏和平解放，的确作出了重大贡献。

## 川西人民的援藏情谊

魏 克

1950年1月10日，经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的提议，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担负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光荣任务。十八军全体指战员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并立即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思想上、组织上、物资上的进藏准备工作。川西人民听说十八军要解放西藏，许多有志之士，特别是青年学生积极要求参军进藏，就连一些大学教授也不甘落后，像华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安宅、于式玉夫妇都已年近半百了，也向贺龙司令员要求参军。贺龙司令员批准他们的要求，并立即介绍到十八军来。著名藏学家谢国安年已65岁，和他的女婿刘立千、时光以及祝维汉、傅斯仲等人也积极要求随十八军进藏，为统一祖国大陆尽一份力量。这些教授学者为帮助领导熟悉西藏情况、制定政策、勾通汉藏之间的关系、开拓西藏的文化教育事业以及翻译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十八军五十二师驻在犍为县，是年1月14日，就有来自犍为县、青神县、五通桥等地的109名青年学生要求参军，同年9月15日，军大八分校二分队从成都招收青年学生1268人，加入到进军西藏的行列中来，分配到五十二师文工队的青年学生，便积极地参加为动员部队进军西藏而准备演出的大型歌剧《刘胡兰》、《血泪仇》和《钢骨铁筋》等剧目中去了。新参军的张俊如担任主角刘胡兰的演出，受到干部、战士的好评。

十八军从接受进军任务起，到离开川西奔赴康藏高原的日

子里，一直受到川西各级党政军民的热情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3月29日，五十二师一五四团作为进军西藏的先遣支队从乐山出发，路过夹江县时，欢送先遣支队的党政军民像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到公路上，献给先遣支队的各种慰问品也堆满公路两旁，当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同志乘坐的吉普车来到欢送行列时，人群里响起了热烈的鞭炮声、锣鼓声和口号声：“进军西藏的先遣支队最光荣！”、“解放西藏，保卫国防最光荣！”、“你们走到那里，我们就支援到那里！”的口号声此起彼落。车队缓缓通过欢送的人群时，夹江县的广大人民群众，将鼓动传单、大批慰问信、慰问袋、香烟、花生、糖果、熟鸡蛋等，纷纷抛向每一辆军车和战士的怀中，把一碗碗热茶水、糖开水送到每个同志的手里。指战员们也都情不自禁地挥动手中的枪支、帽子和衣物表示回敬，并高呼：“感谢川西人民的亲切关怀！”、“我们一定把毛泽东的胜利旗帜插上喜马拉雅山！”。

先遣支队离开川西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忍受高原严重缺氧的折磨，于4月28日到达康北重镇甘孜。由于携带的粮食已经吃完，当地又不能大量采购，粮食一时陷入困境，部队靠挖野菜、捉地老鼠、捕麻雀充饥。上级得知这一情况后，令先遣支队用银元从当地土司、头人那里购买了十余万斤粮食，西南军区首长又命令空军，从新津驾驶飞机飞越天险，于5月7日至17日，紧急向甘孜空投11吨粮食，缓解了部队断粮之困。

当年四、五月，先后成立了以川西行署副主任阎秀峰、西康省军区代司令员方升普为主任的川西地区、西康省支援委员会，开展支援十八军的进藏后勤保障工作。

五十二师从50年初到8月底，在眉山三苏公园召开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后的8个月的进藏准备期间，川西各县的人民对

十八军各部队，从人力、物力、财力和精神上做到了全力和无微不至的关怀。部队在将要离开川西向西藏进军的前夕，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按照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上级的要求，开始向川西人民做告别工作，各级领导亲自召开座谈会和登门拜访，征求各方面对部队的意见。检查群众纪律的同志则忙着送还借用群众的物资，赔偿丢失或损坏的东西。战士们把住地街道和房东的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房东和左邻右舍的缸、桶、盆、罐都担满了水，用最朴素的语言和行动感谢川西人民的支援和情谊。而川西的父老兄弟姐妹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凝聚起来的拥军和支援进军西藏的热情，在即将分别的日子里更加高涨起来了。接连几天师部驻地的群众敲锣打鼓给部队送来几十面锦旗，锦旗上写着：“人民子弟兵的好榜样！”、“解救藏族人民出水火！”、“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等字样。我们宣传科在向房东告别时，两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再三叮嘱：“你们到西藏去，山高路远，气候恶劣，千万要保重身体，到了西藏，一定来信，只要见到你们的一个字，我们就放心了……”话虽不多，老人家像对待出远门的孩子那样牵肠挂肚地关怀着我们进军西藏子弟兵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

9月1日黎明，战士们正整装待发，眉山县的乡亲们便带着各种礼物，拥挤在街头巷尾为我军热情送行，师部和一五五团从眉山到新津县的40公里的路上，沿途的城镇和乡村都搭起一座座欢送彩门，每当部队的汽车通过时，夹道欢送的男女老幼，纷纷把慰问信、慰问袋、香烟、香皂、毛巾、鞋袜、书刊和日记本送到战士们的手里。一些青年学生把鲜花和彩纸片撒满战士的身上，把运送我军的每辆汽车都打扮成了彩车。一位70多岁的于大娘举着彩旗高呼：“请你们把毛主席的阳光雨露一定带给西藏同胞！”

沿途人民那种欢送部队的热烈情谊，温暖和激励着每个指战员的心。大家不停地挥手致意，并高声呼喊：“感谢川西父老们的关怀！”、“我们一定把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意带给藏族同胞！”许多战士被这热烈的气氛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一五五团机枪连 50 多岁的炊事员李学文同志激动地说：“我在家土改分土地、分房屋时也没有今天这样高兴。我老了，也要坚决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不然，对不起川西的父老兄弟！”17 岁的小战士尹振远说：“别看我年纪小，进军路上不但不掉队，还要把人民给我的力量去帮助别人，那怕拿一双 3 斤重的毛皮鞋也行！”炊事班长王福源说：“过去我在国民党部队当兵到过甘孜，那时，我们走到那里，老百姓都躲得远远的，怕我们派差和抓壮丁；今天，我们部队要进军西藏，乡亲们就象亲人那样围着我们，热情地款待我们，这真是两种军队两重天啊。我今年 40 多岁啦，第一次享受到了受人尊敬的幸福！”有位彭巨生同志为了表达感谢乡亲们的亲切关怀，边走边撕下日记本上的纸写上两句感谢的话，送给欢送的群众，还没有走到彭山县，一个本子的纸就撕光了。

40 公里的路程汽车整整走了一天，到新津已经黄昏了。为了过河，车子刚一停，等候欢送的人群就把汽车围了起来，有的端茶，有的送烟，老大娘把熟鸡蛋剥去皮，硬是一个一个送到战士们的手里，亲眼看着战士们吃下去才高兴地离去。老大爷们斟好酒端给战士们喝了，才满意地放你走。还有十几位中年妇女带着针线，看到那个同志的衣服有点裂口或掉个扣子，便认真地给他缝补起来。群众的热情欢送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给部队指战员增添了解放西藏的无穷力量。

进军西藏光凭战士们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士气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而后勤保障工

作更是各级领导特别关注的大事。早在 1950 年 2 月西南局会议上，邓小平书记就明确提出：“进军西藏的主要困难是交通问题”。贺龙司令员进一步强调：“运输问题，要比用兵困难好几倍。”随即提出了“补给重于战斗”的指导原则。西南军区以最大决心解决运输补给问题。首先“不惜一切代价修路”，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从当年 4 月起就投入修路，并设立雅（安）甘（孜）工程局，除统筹经费材料外，并从川康调集 3000 名技工参加修路，后又增加 2000 名技工，配合十八军的部队、汽车、工兵 1 万 5 千名筑路大军，经艰苦奋斗，到 8 月 25 日，将雅安至甘孜段 603 公里公路修通，为昌都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交通保障。

5 月 13 日，西南军区首长决定：支援司令部与工兵司令部合并，成为统一的支援司令部，由张国华军长兼任司令和政治委员，谭善和为副司令员，胥光义为副政治委员，司令部移住新津，并要求“川西与西康的支援委员会应接受支司提出的需要，直接全力供给之。”采取各种手段前运物资。除去支援司令部指挥的 3 个汽车团，3 个辎重团（骡马大车）担负运输外，还有当地群众支援牦牛运输。牦牛运输是康藏高原上的主要运输手段，十八军的首长通过康区的土司、头人夏格刀登、降央伯姆、邦达多吉等入，并派军代表，动员西康之甘孜、德格、邓柯、石渠、炉霍、道孚、雅江、理化（理塘）、巴安（巴塘）等 8 个县，出动 1 万 5 千头牦牛支援运输。这样，才将近两千吨的粮食、冬衣、固体燃料以及黄金 3000 两、银元 270 万元，从川西按时运往前方确保补给所需。川西地区和西康省支援委员会，还在沿途设置食宿站，给进藏部队以大力支援。由于川西和西康人民在人力、物力、财力和精神上的全力支援，才保证了进军西藏的昌都战役的圆满胜利。

## 成都解放前夕反动武装集团“兆总”之始末

曾庆侯      熊 杰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之后，乘胜挺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蒋介石不甘心他的灭亡，困兽犹斗，在大西南的成都等地，纠集军阀、官僚、地主、土匪、特务等以封官授禄，招兵买马，集乌合之众，负隅顽抗，妄图垂死挣扎。并以所谓“应变”，不惜以钱粮、枪弹，引诱川军阀刘兆黎、王缙绪、唐式遵、刘树成等人组织反动武装集团，为之效命。

当时，“成都军校”正在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广招各地袍哥首领、土匪头子、恶霸土豪及特务走狗等为其死心踏地抗拒解放。刘兆黎以其往日任四川保安司令时，集纳的一批黑帮听其使唤，在蒋的官、钱引诱下，跳上窜下，把黑手伸向“游干班”，串连该班中臭名昭著，怙恶不悛的袍哥首领冷开泰、张联芳，土匪头子袁树江、李泽如，军阀师长刘树成，懋功土司老婆孙王贞，哥老会成都中联新华总社社长曾成志（曾受中共川西地下党员吴南岩、胡春圃两同志旨意并由吴通过“军校”少将科长陈某的关系进入的），以及蒋介石的爪牙“军校”处长王旭夫等108人，仿效梁山弟兄一百零八将插血为盟，结为金兰，誓同生死，为蒋卖命。

1949年8月，刘兆黎约同唐式遵、王缙绪、王旭夫四人赴重庆企图晋见蒋介石，要求封官，表示愿意成立部队抗击解放军。老奸巨滑的蒋介石知道他们力量不大，拒不见面，四人

灰溜溜的回到成都。但仍贼心不死，分别召集旧部人员，招兵买马，组织反共部队。刘兆黎特别把“游干班”的金兰弟兄作为骨干。曾成志在受训完毕后，借受刘的重托（实际是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示），返回灌县蒲阳及彭、崇等地活动，招兵委官，组织部队。当时委派彭县城关镇长扬子亭、崇宁唐昌镇长龙定一以及周育林、张俊清四人为大队长，并聚集人枪约八百之众，表面上为刘兆黎成立部队助了一臂之力，刘因之对曾特别器重。

1949年9月，刘兆黎、王纘绪、唐式遵、王旭夫四人，以啸聚一些散兵游勇，纠集一批袍哥匪徒，虚张声势，以委官为目的，再次到重庆向蒋介石请命，蒋已面临穷途末路，于是命行政院长阎锡山下令：任命刘兆黎为“川西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王纘绪、唐式遵、王旭夫等亦均受任命。

刘兆黎接到委任总指挥的命令后，星夜赶回成都，将其心腹邀集在大有巷他的家中，弹冠相庆，分别委以官职，计有：

·李元宗任中将副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

肖步鹏任少将参谋长兼第二路司令；

贺照临任少将参谋长以及纵队少将司令曾成志等13人。

各司令公布后，刘兆黎又到灌县蒲阳镇曾成志家同曾密谈，并要曾担任总部直属纵队少将司令。总部番号为“兆总”，曾成志纵队番号为“兆志”，并把曾原组成的4个大队扩编为28个支队。

“兆总”一共任命了13个纵队司令，各纵队也先后在成都各地宣告成立。其中除了刘曼来纵队招集300余人，李泽如招集当地土匪一营人，马尧卿有两个连，刘海廷招纳袍哥约500人外，其余纵队都是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兆总”本部总共有一百余人，连同各纵队总共不足两个团。

“兆志”纵队主要依靠灌县、彭县、崇宁、威州、理县、懋功等边区和山区的袍哥、乡镇长、地主等武装，在原有4个大队基础上，新任命张俊卿、郑九如、王雨音等12个支队长，后来扩编为28个支队，下设314个大队，妄称两万多人。这个纵队在成都也聚集一些大多穿长袍马褂的“官兵”，武器有少数步枪、手枪。所有官兵既未受过正规训练，又无作战能力，实际上是一群乌合之众。刘兆黎野心很大，妄想把这支部队编为主力正规部队，直属总部指挥。因此他与曾成志商量要设法解决服装、粮饷和枪支弹药等问题，并把曾部迁到成都羊市街总部（后迁到郫县望丛寺），以后部队有所发展，蒋家王朝彻底覆灭已成定局，且迫在眉睫，一些散兵游勇纷纷投靠“兆总”。其中，刘兆黎和曾成志也曾先后3次在重庆、成都军校领到一些迫击炮、六二炮、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弹药充实部队。

在此期间，曾成志与中共川西地下党负责人胡春圃、吴南岩随时联系，汇报活动情况（曾与吴系“把兄弟”，先后汇报了“游干班”一百零八将的结盟、“别动总队”的组织和“兆总”成立发展等情况），胡、吴两同志要曾继续扩大队伍，监视罗广文、宋希濂、陈尧非等部的活动，作好起义准备，配合解放军全歼国民党残部，以迎接成都解放。

1949年12月9日，川军将领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在彭县通电起义后，刘兆黎、李元宗、曾成志商量，还想领取枪支弹药扩大武装。曾及时向地下党反映，胡、吴授意曾“听候指示，不要单独起义。”

1949年12月19日，刘兆黎再次召集李元宗、曾成志商议，研究部队出路问题，刘想把部队拖进16行政区山区打游击。曾不赞成并说：成都附近各县部队都已起义，要想进山打